

***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 937-976.* By Johannes L. KURZ.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1. X + 131 pp.**

*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 937-976*主要關注的對象是十世紀中國南唐政權的興衰。作者通過敘述試圖揭示南唐政治格局的變遷。本書內頁正文只有138頁，嚴格來說只算是一本小書或小冊子。本書並沒有突破前人觀點，內容也是以傳統的政治敘述為主，書中更出現不少學術規範方面的訛誤和缺失。筆者對其學術價值抱有疑問。

本書包括引言、結語和四章正文。作者在引言中申明，其撰寫動機是要強調南唐對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因為北宋延用大量南唐文官和利用了南唐遺下的書籍和藝術品以豐富其皇家藏品，編製類書，大力促進了宋代的文化事業發展，說明了南唐對北宋的文化影響力遠遠超過五代十國時期的其他政權。而在論述手法上，作者在全書中以敘事為主，而且為了讓內容更具可讀性，故以司馬光《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和李熹《續資治通鑑長編》為主要參考資料，其他史料只佔輔助地位。

本書主體內容基本按南唐君主在位時間分為四章：第一章〈吳國〉主要簡述淮南地區政權的發展過程，包括晚唐時期淮南楊吳政權建立的情況，並敘述楊吳大將徐溫如何在楊行密死後控制楊渥和楊隆演的廢立以及剷除政敵以達到把持吳國朝政的目的。接着便開始介紹徐溫養子徐知誥（即日後的李昇），包括他如何抗衡徐氏諸子，以及得力於宋齊丘和周宗等人的出謀劃策，從而在與徐知訓的政治鬥爭中獲勝，取得徐溫的信任。隨着徐溫的去世，徐知誥也實握吳國朝政，具備篡奪楊吳政權的實力。

第二章〈南唐的建立與李昇的在位時期〉講述徐知誥篡奪楊吳建立南唐，復姓李氏，改名昇。作者在此指出了晚唐至五代十國時期突出的政治現象：一方面李昇對外宣稱他是李唐後裔，另一方面在太廟中不僅祭祀唐朝皇帝，也同時供奉徐溫以示對義父的感恩之情。這揭示了晚唐以來義兒現象在政治上的普遍性。李昇在建國後務求穩住局面，拒絕了國內主戰派和隣國的出兵請求；內政方面，李昇自身經歷了徐溫專政和自己篡奪楊吳政權，極不希望歷史重演，故不僅務求消除吳氏與徐氏勢力對政權的威脅，也對宋齊丘等從龍舊臣防範。儘管李昇對繼承人的選擇和朝廷內部的政治鬥爭等為李璟以後的統治困難埋下伏筆，但總的來說，作者肯定了李昇的統治對安定當時南唐社會與經濟局面的作用。

第三章〈李璟的在位時期〉所呈現的是南唐由盛轉衰的景象。李璟即位後除了以宋齊丘為相外，也寵信包括了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和查文徽等傳統目之為「邪佞」的人。在政治上反對他們的則有孫晟、常夢錫、蕭儼、韓熙載、江文蔚等士人。作者沿用傳統的說法，認為李璟的個人性格不夠決斷，缺乏駕馭臣下的能力，這兩個派別的鬥爭更使南唐內部的政治不穩。而有別於李昇保境息兵的對外方針，李璟試圖藉閩、楚兩國內訌發動征伐戰爭。然而由於他馭將無力和戰術失誤，導致征伐戰爭失敗告終。而在淮南之戰中南唐面對後周大軍壓境，縱使個別將才如劉仁瞻及柴克宏等力挽狂瀾，卻因為後周將帥們的果斷應變和南唐內部的政治鬥爭而導致的決策失誤，使李璟無法挽回劣勢。而隨着南唐戰敗，李璟也貶斥宋齊丘和陳覺等之前曾壟斷朝政的勢力，南唐的國勢也告衰落。

第四章〈李煜的在位時期以及南唐的衰落〉呈現的是南唐晚期的衰亡。李煜繼承了李璟晚年對北宋的政策，在政治上對北宋擺出了謙恭的姿態，儘量避免刺激北方政權再度出兵，例如他把其名號由南唐國主改稱江南國主；另一方面又逃避宋太祖對其的召見。李煜不僅對政事並不熱衷，對戰爭也沒有作充份準備，並誤中宋太祖的反間計而賜死主戰的林仁肇。當決意消滅南唐的北宋軍隊圍攻首都金陵超過半年後，李煜只能束手投降，南唐政權正式滅亡。作者在這裡對南唐三位君主作出簡單的評價：李昇具有遠見和實現理想的能力；李璟希望模仿其父，但受權臣的左右，在政策推行方面顯得不夠果斷；儘管李煜因為其文學成就而留名後世，其政治行政能力卻是南唐三個君主中最弱的一個。

在第五章〈結語〉中，作者筆鋒一轉，把焦點從南唐的政治轉到它的文化遺產。作者簡述了南唐對促進北宋文化發展的作用，例如北宋在南唐皇家圖書館藏書的基礎上編纂了《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等重要類書。而樂史《太平寰宇記》等重要著作也反映了南唐對後世的文化影響力。而由於有不少南唐文人在入宋後撰寫南唐的歷史佚事，開啟了北宋以後人們對南唐歷史的研究興趣。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知作者試圖為讀者提供一個南唐內部政治局勢與戰爭情況的概況。筆者以為，作者在本書中為敘述上的方便而依賴使用《通鑑》，可謂是一把雙刃劍：其好處是《通鑑》的內容的確側重於政治事件，只要作者能準確翻譯《通鑑》的原文，讓西方讀者能初步了解唐末五代時期南唐的政治；但另一方面，作者在書中聲稱要為南唐的軍事、政治及文化史作一個全面的綜述，而實際上作者對南唐的文化影響只在總結部份以不足四

頁的篇幅草草略述。本書內容側重於南唐國內的政治鬥爭與戰爭的描述，而忽略了對南唐的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文化藝術的成就、宗教發展等方面的深入分析。正如柯胡(Huge Clark)較早前對本書的評價指出，南唐的文化遺產其實比南唐的政治情況對後世更具意義(Huge Clar, “Book Review: *China's Southern Tang Dynasty, 937-976* by Johannes L. Kurz, and *Power and Politics in Tenth-Century China: The Former Shu Regime* by Hongjie Wang,”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2(2012): 461)，而本書卻過份偏重於對南唐上層政治的敘述，與其宣稱的目標不符。

筆者進一步認為，即使作者把本書定位為入門參考，也應該善用現有對南唐的研究成果。比如本書在參考書目中只收入了任爽的《南唐史》(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和鄒勁風的《南唐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其實鄭學檬的《五代十國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對五代和十國政權治下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早已有概括性的分析，而杜文玉《南唐史略》(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更是近年來介紹南唐各方面情況的學術專著。在本書中反而沒有把這兩本著作包括在書目內，實在讓人莫名其妙。即使是集中於介紹南唐政治和軍事史，可讓作者參考的成果也有不少。以南唐黨爭的例子為例，何劍明《李氏南唐國史論稿》(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231-235)指出近年來國內學者已經開始脫離了小人君子對立的傳統概念，認為傳統史料有把宋齊丘等人故意貶低的傾向。筆者以為，不論作者是否認同這些研究及觀點，都應該對此作出回應，否則是迴避現有的學術成果。

另外，作者對部份史料的翻譯處理上似乎值得商榷，以下筆者試列舉數條：如作者在書中引用李建勳評價李璟性格時的翻譯為“Our new ruler possesses benevolence and humaneness to a high degree, and in this he is like the late emperor. His character, however, is weak and irresolute.”(頁43)。作者此處未有註明出處，但按內容似出於《通鑑》卷283：「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北京：中華書局，1956，頁9248)作者把「優於先帝」翻譯成「如同先帝」，「性習未定」譯作「柔弱及優柔寡斷」，與《通鑑》原文意思有所不同，未知其所據何本。筆者以為，作者此處不標明出處，本屬不妥，而他對引文的翻譯也未能完全貼近原文，也似乎對原文有理解上的差異。另一個翻譯有誤的地方見於周世宗對鍾謨和李德明的話：“I am not one of the foolish rulers of the Six Dynasties, so how could you ever think to change my attitude with your talk?”(頁75)作者在此處同樣未有註明出

處，但實際上《通鑑》載「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卷292，頁9540）。按胡三省對此句的註曰：「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卷292，頁9540）可見此句中的「六國」當作戰國的六國理解，而不應該是作者所理解的六朝。而按照西方的習慣，六國應譯作“Six Kingdoms”，而六朝（指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南方王朝或魏、西晉、北魏、北齊、北周、隋六個北方王朝）才譯作“Six Dynasties”（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 *Chinese History: A Manual,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10-11）。

此外，本書也犯了四種學術規範錯誤。這些可分為：一，引文缺少註釋：書中有大量直接引用《通鑑》並翻譯成英文的地方，但只有少部份是註有史料來源；二，有些地方儘管註有出處，但含糊不清，如作者嘗試引用韓熙載有關對李昇死後謚號的議論時指稱此出於“YHQH, 9. 94”（頁123），然而作者在書目和縮語說明中沒有標明。按《玉壺清話》卷9〈李先生傳〉條原文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今先生，中興之君也，宜當稱祖。」（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94）可見作者註釋中的YHQH即是《玉壺清話》的漢音拼音縮寫。同樣地，作者在第四章注釋部份引用《南唐舊事》時以“NTJS”為縮寫代表（頁126），卻沒有在縮語說明中解釋；三，引用史料頁碼或書名錯誤：作者敘述朱瑾殺徐知訓一事時把資料來源繫於《通鑑》，卷270，頁8827，然實際上該頁所記載的是徐知訓與李德誠交惡的過程，朱瑾設計謀殺徐知訓的記載是在頁8828至8829。又作者引用了Andrew Eisenberg的*Kingship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8)，但在書目裡卻變成“Kingship in Medieval China”（頁130）；四，中文拼寫訛誤：在中文的寫法錯誤方面，本書在索引部份把鍾謨的「鍾」寫成「謹」（頁137），又書目把《南唐史》的作者任爽的「任」寫成「仁」（頁131），而索引中把《太平御覽》中的「御」變成「禦」（頁134）；英文拼寫錯誤則主要是拼錯人名的漢語拼音，如作者在書中提及江文蔚時，把他的漢語拼音“Jiang Wenwei”誤寫成“Jiang Wenyu”（頁48、58、69-69、92），而提及劉仁瞻時把“Liu Renshan”誤拼寫成“Li Renshan”（頁79）。

除了以上的訛誤外，更令筆者不解的是書中對人名和地名的處理方式。作者在書中的索引製作顯得較為粗疏，如江文蔚等在文中反復提及的人物，都沒有包括在索引內。另外是在史料上經常出現的同地異名的問題。比如書

中講述周世宗攻打南唐壽州之戰爭時，既用上壽州(Shouzhou)，也提及壽春(Shouchun)（頁72）。但作者對壽州和壽春的交替使用既沒有在內文中作出說明，也沒有在索引中提及，造成行文的不統一，顯然會為不熟識中國歷史的西方讀者造成閱讀上的混亂。

總之，本書之出版也許能增進普通外國讀者對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政治史的基本認識。但對本身從事五代史研究工作的人而言，本書不僅沒有對現有的有關南唐的研究成果作出總結或指出任何改善空間，也沒有提出任何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而且書中充斥不少訛誤和學術規範方面的失誤，對讀者可能會造成不方便，還望作者對此多加留意改進。

關榮勻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 (Monie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East Asia, 1600-1900). By Hans Ulrich VOGE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xxxii, 643pp.

如果要列舉世界史上最知名與最具影響力的旅行家，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無疑會名列前茅。他於1271年隨其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自威尼斯出發前往汗八里(Cambaluc, Khanbaliq, 即大都，今北京)，並且充任忽必烈汗廷的官員，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但他是否真的到過中國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早在19世紀初，學界就已經出現質疑聲浪。而吳芳思(Frances Wood)於1996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漢譯版於1997年由新華出版社發行)，則是過往質疑論調的當代代言人。基本上持懷疑論者主張在其遊記中並未述及長城、茶葉與纏足等中國事物，而其他切合歷史事實的記載則可能是抄襲其他波斯、阿拉伯與西方人的著作或言論而得。

吳芳思的懷疑論調很快就受到許多歐洲中古史家與蒙古學家異口同聲的反駁。其中又以傑克生(Peter Jackson)的論文〈馬可·波羅及其「行紀」〉("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